

大国区域经济发展空间新格局下 城市群基本发展样态与趋势研究

郭先登

(青岛市社会科学院,山东 青岛 266071)

[摘要] 面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进入前无古人伟大实践新时期,域际发展进入史无前例稳中奋进新时代,相邻单体城市合作形成的城市群进入协调协同一体化发展新常态。城市群站在同一时间节点的新起跑线上,需要坚定不移地以习近平治国理政伟大学说为指导思想,在深入践行“城市群建设为载体”的科学论断中,深刻认识城市群基本发展样态,把握好城市群基本发展大趋势,将城市群打造成为国民经济发展的增长极点与核心支点和拥有各种生产要素汇聚与扩散的强大功能性域际空间载体。

[关键词] 城市群;发展;基本样态与趋势;研究

[DOI编码] 10.13962/j.cnki.37-1486/f.2017.05.018

[中图分类号] F061.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5-3410(2017)05-0136-10

一、问题的提出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带领中国人民进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实践中,形成习近平治国理政伟大学说,创造了“脚踏神州大地,尽显领袖风采,叱咤世界风云,成就伟业虹彩”的不朽历史画卷。在习近平治国理政伟大学说的理论宝库中,其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新论述、新思维、新论断,全面系统、视野开阔、内涵丰富、思想深邃,为加快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指明了新方位、新方向、新趋势。深入学习习近平治国理政伟大学说,更加需要深刻认识习近平同志做出的区域协同发展以“城市群建设为载体”的科学论断,以指导实施大国区域经济发展空间新格局为主体的区域发展总体战略,开创新常态化经济社会发展新局面。

随着城市化与新型城镇化发展步伐的加快,在一个区域空间里大中小城市相继崛起与快速发展,相邻城市之间空间联系度呈现越来越紧密的发展趋势。由城市创新力、枢纽力、结构力(理论称之为“三力”)不断产生强大新动能的推动下^[1],单体城市空

间已经独自难以容纳越来越快速发展的生产力,形成城市生产力越界发展的态势,这就客观的要求相邻大中小建制市通过协调协同发展,形成“1+1>2”的合作空间。这种合作空间不断发展推动促成越来越大社会生产力的实践,催生了“城市群”理论概念的形成;反过来,以“城市群”理论概念指导实践,形成了“城市群”经济发展新模式。进而,以“城市群”拥有的强大创新力、枢纽力、结构力,推动形成以“城市群”为主体空间的“城市经济圈”生产力新布局。“城市群”与“城市经济圈”在理论概念上的区别是,前者表达的是由完整的数个或数十个建制市行政管辖全域,形成发展边界拥有精准地理坐标与公认分界的清晰性完整性行政管辖空间的鲜明特征。后者表达的是城市群通过“三力”合力推动,形成具有跨省域或建制市行政管辖范围,而又具有一定模糊性空间特征的“城市经济圈”;模糊性空间决定的“圈”,会产生圈的“波纹效应”,推动圈的有“界”或无“界”,甚至是以“飞地”式相联的空间载体,形成域际的“圈经济”。为理论上表述方便,实践上易于操作,把两者结合于一体,一般称之为“城

[作者简介] 郭先登(1949—),男,山东平度人,青岛市社会科学院专业技术职务二级岗研究员,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津贴专家。主要研究方向:区域经济学、现代经济理论。

市圈群”,使之成为构建与完善大国区域经济发展空间新格局的主要内容之一。

实证研究成果显示,“城市圈群”会依生产力的发展而发生内生变化和空间变动,随着实践的发展推动“城市圈群”出现新的组合,建设新的城市群空间载体。笔者在《大国区域经济发展空间新格局理论与实践新发展的研究》中,提出了比较完整的在创造沿海沿江(河)沿线沿路经济带为主的纵向横向经济新轴带的进程中,建设若干个“城市圈群”的构想,本文不再赘述。本文需要进一步论证的是,随着城市圈群经济快速发展,若干单体城市或城市圈群会“脚踏多只船”,成为数个大区域“城市圈群”经济相互交织融合发展的空间载体。最为典型的是合肥市和合肥为中心纽带形成的江淮城市群既是长江三角洲城市群的重要成员,又是长江中游城市群的东翼空间载体。这样就需要位居不同大区域的城市群,通过建立更高形式的联合发展新形态,实施国家区域发展总体战略。实证研究成果显示,辽宁省是环渤海经济圈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圈的“波纹效应”出发,位处东北大区域的辽中南城市群,更应与京津冀城市群组合更高形式的联合发展新形态,以加快推进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进入前无古人伟大实践新时期,域际发展进入史无前例稳中奋进新时代,相邻省域或单体建制市形成城市群开创了新常态化协调协同域际一体化发展的新局面。在《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公布后,随着理论与实践的发展,党和国家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中,明确提出遵循经济社会发展阶段性规律,规划期内极其需要优先“优化提升东部地区城市群,建设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世界级城市群,提升山东半岛、海峡西岸城市群开放竞争水平。培育中西部地区城市群,发展壮大东北地区、中原地区、长江中游、成渝地区、关中平原城市群,规划引导北部湾、山西中部、呼包鄂榆、黔中、滇中、兰州-西宁、宁夏沿黄、天山北坡城市群发展,形成更多支撑区域发展的增长极”;同时“促进以拉萨为中心、以喀什为中心的城市圈发展”。随着规划的落地落实,中国正在加快推进20个城市群实质性建设的步伐。

从域际空间发展基本理论概念出发,列入跨省域的城市群有9个(长江三角洲城市群、珠江三角洲城市群、京津冀城市群、长江中游城市群、成渝城市群、哈长城市群、呼包鄂榆城市群、兰西城市群、海峡西岸城市群);位处省域内跨省辖建制市的有11个(山东半岛城市群、辽中南城市群、关中城市群、中原城市群、江淮城市群、北部湾城市群、天山北坡城市群、晋中城市群、宁夏沿黄城市群、滇中城市群、黔中城市群)。其中,长江三角洲城市群、珠江三角洲城市群、京津冀城市群、长江中游城市群、成渝城市群“五大”城市群被列为国家级城市建设范畴;更有以上海为龙头、跨沪苏浙皖的长江三角洲城市群、以粤港澳大湾区为主导的珠江三角洲城市群、以京津冀协同发展为首推动力的京津冀城市群“三大”城市群建设世界级城市群。按照城市群位处的地带划分,东中西部三大地带分别有9个、3个、8个。实证研究成果显示,城市群理论与实践新发展,使城市群正在成为域际大区域生产力空间布局里最具发展活力和潜力的核心区域空间;成为国民经济发展“行稳致远”的增长极点与核心支点;成为大国区域经济发展空间新格局里能把各种生产要素汇聚与扩散的强大功能性域际空间。

本文以国家确定打造的20个城市群为具象型实证研究对象;以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为己任的东北大区域两大城市群和东部地带三大世界级城市群建设为重点抽样实证研究对象。“研究对象”正在进行的实践提出的问题是,面向未来,在深入践行“城市群建设为载体”的科学论断中,如何深刻认识城市群基本发展样态?如何把握好城市群基本发展趋势?这成为重大的时代性课题,也是具有世界意义的重大课题。

二、高举习近平治国理政伟大旗帜,深刻认识城市群基本发展样态

高举习近平治国理政伟大旗帜,是全党全军全国适应发展新时期新时代所肩负的伟大历史使命^[2]。习近平治国理政伟大旗帜说,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新思维、新论断、新战略为鲜明特征,凝聚了全党理论智慧,全面、科学、系统、完整地阐述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党的主张、国家意志、人民共识的基本理论

概念;从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科学及社会各个领域创造性地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与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一脉相承。习近平治国理政伟大学说已经成为全党、全军、全国人民进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是引领发展方向的当代马克思主义的伟大旗帜;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强大思想理论武器;是人类经济社会发展进程中永放光芒的灿烂文化思想,是指导城市群发展的强大思想理论武器^[2]。

高举习近平治国理政伟大学说的光辉旗帜,需要以道路自信、制度自信、理论自信、文化自信,引领发展,牢固把握好“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发展方向,以全局思维、战略思维、辩证思维、法治思维、系统思维、底线思维、创新思维为主体的“七大”新思维,遵循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规律、改革开放发展规律、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规律这“三大规律”为主体内容的发展规律体系;需要牢固确立统筹推进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为主题的“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协调推进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为主题的根本战略布局的新战略观,紧握以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为主题的“五大理念”这个唯一指挥棒;需要牢固坚持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四个意识”,特别是核心意识、看齐意识不动摇;需要牢固把握实施“一带一路”国家大战略确立的“和平之路、繁荣之路、开放之路、创新之路、文明之路”的科学定位,以“五通”合力创造“五路”互联,形成同步并进新格局、互为因果新模式;需要牢固铸塑以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为主题的国家、社会、个人三个层面于一体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形成城市完善的人文价值体系,铸就世代传承的永恒城市精神;需要牢固树立城市以统筹发展空间、规模、产业三大结构,统筹规划、建设、管理三大环节,统筹改革、科技、文化三大动力,统筹生产、生活、生态三大布局,统筹政府、社会、市民三大主体为主体内容的发展方针,创造城市发展空间理想的统筹运行生态^[3],实现城市由善政向善治的伟大跨越,以总体国家安全观,经受住“四大考验”,防

范好“四种危险”,使城市群始终保持和谐、稳定、安全的运行状态。

高举习近平治国理政伟大学说的光辉旗帜,以习近平治国理政伟大学说指导城市群发展,必须遵循城市群发展规律,深刻认识城市群基本发展样态。面向未来,城市群基本发展样态关键词是,新制度、新模式,新方位、新形态,新手段、新格局。从深刻认识的视角看,要点如下:

一是深刻认识城市群新制度、新模式的基本发展样态。笔者对正在建设的20个城市群实证调研成果显示,城市群作为跨省域、跨省域内省辖建制市的域际发展相对独立的层次空间,当建设城市群进入实质性的历史阶段,现存的治理体制与机制满足不了“圈群”生产力发展的客观需要。如曾经被称之为中国第四大城市群的山东半岛城市群,由于城市群新治理制度建立的迟滞,只能从“第四”的位置退后,至今也没有形成一体化协同发展的新格局;再如东北大区域的哈长城市群由于治理体制等原因,也没有进入城市群协同发展一体化的运行状态,直接影响了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的进展速度。城市群新制度、新模式的基本发展样态,决定了必须通过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导的深化改革,以适时调整适应“圈群”生产力发展需要的生产关系,才能建立以符合城市群发展需要的治理体制与机制,形成新制度,并随着实践的发展不断创新以新制度为保障的发展新模式。

深刻认识城市群新制度、新模式的基本发展样态,需要城市群层级党政机构从单体城市传统管理的思维束缚中完全解放出来,从“圈群”基本空间载体的概念出发,创新城市群推进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体制与机制,建立“圈群”联合型综合善治体系^[4]。城市群建立联合型综合善治体系,需要长期坚持党的基本路线毫不动摇,始终保持经济发展与社会实现长期、健康、可持续协调发展;长期坚持社会发展重心定位毫不含糊,科学驾驭“党与社”、“政与社”、“社与社”三大关系和谐发展的规律,使城市群建成与经济结构相适应的现代化社会结构;长期坚持三大主体沟通融合、相向而行、共建共享毫不走样,不断提高多元化社会治理新体系的运行水平,促使城市群加快推进全域治理体系和治

理能力现代化^[5]。

二是深刻认识城市群新方位、新形态的基本发展样态。城市群需要对正在实施的“十三五”规划期经济社会发展阶段及更长时期的发展方位做出科学的判断,在正确判断的基础上,确定“圈群”发展新方位,以形成发展的新形态。笔者引用《人民日报》2016年岁末专文一段话,中国是创造了二战后一国经济高速增长持续时间最长纪录的经济体,正面临速度换挡节点、结构调整节点、动力转换节点,在螺旋式上升的发展历程中进入了一个发展的新方位。作为规划期开局之年的2016年,全国实现GDP744127亿元,同比增长6.7%,提前4年实现了党的十六大提出的国内生产总值到2020年比2000年翻两番的目标;2017年全国按照同比增长6.5%计算,人均GDP将提前3年实现党的十七大提出的人均GDP到2020年比2000年翻两番的目标;按照可比口径计算,全国到2020年将完全实现党的十八大提出的GDP总量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的目标;中国与世界比较看,2016年中国完成GDP总量继续超过10万亿美元,实现6.7%的增长速度,比美国的1.6%高了5.1个百分点,比日本的0.6%高了6.1个百分点,成为世界经济增长速度最高的国家之一。大数据充分显示,可预测的未来,中国经济必将整体呈现出总体平稳、稳中有进、稳中向好总态势,自2008年以来,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率已远超美国、欧元区等国家和地区,2016年达到33.2%,成为世界经济不可动摇地重要“一极”,并继续取得伟大辉煌新成就;城市群必将体现出活力、效益、质量、可持续更有含金量的增长新方位新坐标,从20个城市群发展大趋势判断,其在国民经济发展中发挥着名副其实地“火车头”带动作用^[6]。通过以上论述,非常清楚的证明,新常态化城市群发展新方位,最集中地体现在从传统的“速度模式”到“稳中求进”,再升华到“稳中奋进”,形成新速度模式行稳致远的增长型高端新形态,也成为城市群新方位、新形态基本发展样态的第一个鲜明标志。

深刻认识城市群新方位、新形态的基本发展样态,需要对可预测的未来发展做出科学的判断。当历史进程进入了21世纪20年代新时空后,标志着中国将开始实施经过6个五年规划期的努力、在新中国成立一百年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社会主义现代

化宏伟目标(史称第二个“百年目标”)的世纪大战略;完成第二个“百年目标”后,中国将基本完成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要任务目标,全国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高级发展阶段,中国将完全进入世界发达国家行列,中华民族完全展现出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实现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国家新形象。在这个过程中城市群必将在国民经济发展空间中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主体性层次空间载体的增长极作用。

三是深刻认识城市群新手段、新格局基本发展样态。城市群作为国家发展层次空间载体需要确立在经济全球化和国家经济新版图中的最佳发展位置。在相当长的历史阶段中,中国面对的是经济全球化形成的大发展、大繁荣、大调整的新格局,中国经济增长以新动能为主要手段促进经济发展所发挥出稳定力推的作用,使中国方案开启了全球经济治理新格局,成为推动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之一。城市群需要充分展现出抢占世界经济发展制高点新手段、新格局基本发展样态的新形象。

城市群面对城市普遍为确立在由大国区域经济发展空间新格局绘就经济新版图中的最佳发展位置竞争的新情况,要以“为政之要,莫先于用人”,锻造“用一贤人则群贤毕至,见贤思齐就蔚然成风”的用人新标尺;要以相对独立层次空间载体的新视野突出解决造成“圈群”上一轮为科技和产业革命提供动能不足的问题,突出解决个别单体城市经济增长低速、甚至停滞的问题,突出解决“新赛场”经济发展风险问题。城市群需要站在历史性的新起点上,以未来、理想、可操作的“七字”方针为指导,既确定单体城市特色经济发展主要指向,又明确城市群共性经济发展主要指向,着眼于世界科技与发展未来,制定好指导城市群不断开拓国内外市场发展空间、具有竞争活力的未来型操作规划;着眼于党和国家确立的筑梦、逐梦、圆梦的奋斗目标,在城市创造辉煌历程中,制定好指导城市不断创造巨大成就、市民满意的理想性操作规划;着眼于以突出城乡一体化发展规划、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发展规划、教育科技文化发展规划、城市管理与交通发展规划、社会基本公共服务发展规划、重大基础设施发展规划为主要内容,制定好专项操作规划;着眼于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国家控制总杠杆率,在城市“纸上规

划”具体实施落地落实过程中,促使城市选择越来越多地可持续发展的工程与项目,不断创造新“助推器”、点燃新“导火索”,形成永驻斑斓色彩的操作规划^[7]。笔者在合肥城市群做实证调研目睹,其以“三个突出”、“三个着眼”为基本抓手,实现一体化协同发展,不断提高一体化协同发展水平,显示出示范性作用的新形象。

三、高举习近平治国理政伟大学说的光辉旗帜,牢固把握好城市群基本发展趋势

高举习近平治国理政伟大学说的光辉旗帜,以习近平治国理政伟大学说指导城市群发展,极其需要把城市群作为国民经济发展相对独立层次空间载体,使之与精准实施“一带一路”建设、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三大战略实现完美对接。城市群在深刻认识基本发展样态的同时,要在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上牢固把握好城市群基本发展趋势,其关键词是,生态、结构、融合、智慧、民生。从牢固把握的视角看,主要指向是:

(一)把握好城市群生态型基本发展趋势。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新实践,改变了狭义性“生态”理论范畴,创新广义性“生态”理论新概念,开创出新常态化经济社会完全显现全空间多领域、全方位多层次的生态型发展新局面。城市群作为国民经济发展相对独立层次空间的属性定位,决定了“圈群”以完善的政治与社会生态、生产与消费生态、自然与环境生态为主要内容的生态型基本发展趋势。生态型基本发展趋势决定着在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进程中,需要突出以核心意识、看齐意识为主导的“四个意识”不动摇,不断强化政治生态;需要突出中国共产党绝对领导不动摇,不断强化政府、社会、市民三大主体善治的社会生态;需要突出循环生产全流程不动摇,不断完善“圈群”发展的新经济体系生态;需要突出全社会低碳消费不动摇,不断提高消费生态水平。

城市群把握好生态型基本发展趋势,特别需要以绿色发展理念引领自然与环境生态文明新时代,夯牢“让城市生活更美好”与绿色经济的“金山”地位,使人类经济社会发展越来越自觉地适应自然与环境生态的基本发展趋势。城市群要坚定不移地按照“人因自然而生,人与自然是一种共生关系,对自

然的伤害最终会伤及人类自身”(习近平语)的新论断指导“圈群”发展,率先建成无遗漏的全域绿色发展空间,必须以久久为攻的恒心与韧劲,不断创造把“绿水青山”变为“金山银山”的新模式;必须长期坚持“保护与开发”并举的建设方针,以自然生态保护、环境治理等协调联动为手段,实现“圈群”发展与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相匹配,形成全域发展空间生产力科学配置的合理布局结构,呈现城市群循环低碳经济发展新局面,强力组合所有单体城市适应“圈群”绿色空间发展新趋势^[7]。实践的发展已经使单体城市在城市群内难以单独应对保护生态环境的问题,极其需要城市群构建“圈群”政府、企业、社会三元联合善治新格局,不断强化整体能源互联网建设,形成域内清洁能源使用全覆盖;不断完善“圈群”整体统一的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评估体系制度、磋商制度、法律诉讼制度、生态环境保证金制度、生态环境损害责任保险制度、绩效考核制度、执行监督制度、责任追究制度这“八大”制度,从制度上解决“企业污染、大众受害、政府买单”的问题;不断壮大环境保护市场主体这个关键,打造一批经营规模大、竞争力强、经济效益好、品牌价值高的节能环保服务商,创造市场化自然环境治理与生态保护新模式。

(二)把握好城市群实现合理空间结构布局的基本发展趋势。

笔者已经在多篇文章中反复论述了马克思主义时空观深刻揭示了人类经济社会发展的任何一个历史阶段要实现向更高发展水平阶段的跨越,都需要通过经济社会结构调整而形成推动力来完成;人类所有的经济社会活动都需要按照一定的时间约束在一定的空间内进行;不同域际建立的特色空间结构是由生产力所决定的生产关系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特定的空间具象表现形态,这是永恒不变的发展规律^[8]。作为习近平治国理政伟大学说重要组成部分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建立与发展,深刻揭示了城市群发展必须以“结构科学”为基本标准,统筹“圈群”规划同筹、制度同构、市场同体、产业同链、科教同兴、交通同网、设施同布、信息同享、生态同建、环境同治。上述“十同”是城市群实现“圈群”合理空间结构布局所要采取的最佳操作方案,其核心是“协同发展”。如建立雄安新区,不

是把新区划到北京市的“规划统筹”中去,而是要充分体现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深度与广度。城市群要把握好合理空间结构布局的基本发展趋势,需要遵循规律,确立不同发展阶段而不断进行“结构调整”这一永恒的主题。从实践的发展看,现阶段要高度关注三大“结构调整”。

一是城市“圈群”要高度关注建立一体化高效发展空间布局结构^[9]。为此,要以经济结构合理布局是城市群发展之基的新理念,以建立健全全域产业结构、基础设施规划设计结构为基本抓手,不断强化布局“结构调整”,扎牢单体城市开发边界永久界限的“篱笆墙”。这样,才能准确把握城市群在大国区域经济发展空间新格局中的历史性地位;准确把握推进城市群协调协同发展的目的是让人们生活更美好,创造沿海沿江(河)沿线沿路经济带为主的纵向横向经济新轴带城市群发展新形式新模式。实现“准确把握”要突出“圈群”的地形、地貌、地质、气候、水文等客观存在的自然条件,充分发挥比较区位优势,实现整体空间结构的合理布局;要突出构造协调协同发展高品质文化设施结构,形成一体化历史风貌和历史遗产保护的完整性新结构;突出构造城市群不同历史时期发展空间密切关联的脉络结构,形成塑造城乡交相辉映的宜居宜业宜游新特色,形成功能复合的区域生态空间新体系;突出构造城市群交通、电力、通讯、供水等一体化运行新结构,形成完善的基础设施建设新形象。

二是城市“圈群”要高度关注域内空间大中小城市规模结构合理^[10],加快特色小镇建设。现行行政层级治理体制,决定了扎牢单体城市开发边界永久界限的“篱笆墙”,特别需要在坚决防止滥挂特色小镇招牌中突出有序有效建设特色小镇。笔者在实证研究中看到,通过一个主题、一个主导产业、一个大项目等方式,建设特色小镇,已经成为普遍现象。如无锡市以做强做精数字电影产业为推动力,在建设国家数字电影产业园的过程中,通过把好莱坞市场化理念与中国传统优秀文化发展模式完美嫁接,形成集电影拍摄、影视制作、申报发行、电影交易、金融服务、文化旅游等功能为一体,建成无锡太湖影视特色小镇,对旅游者发挥着很强的吸引眼球作用。

三是城市“圈群”要高度关注域内发展空间新

动能结构的建立。创新建立城市“圈群”发展空间的新动能结构,就是要以大数据为核心资源,以创造新技术、新产品、新业态、新模式为主导内容,在大数据资产价值和使用价值所决定的生产总过程中,实现数据资本化,推动“圈群”发展以数字经济为引领的新经济体系的建立与完善。数字经济是继农业经济、工业经济之后,已经开始引发现代经济社会的伟大革命,正对人类经济社会活动各个领域都产生极其深远的影响;已经全面融入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发展全流程,对人类经济社会活动都会产生极其深远的影响,形成巨大新动能,开创全新的经济增长新周期。按照共识,2013年贵州被认定为“大数据元年”,亦被称之为中国发展数字经济的“大数据元年”。目前中国大数据发展梯次格局显示,已经形成京津冀、长三角、中西部和东北等一批聚集发展区,而这一批“聚集发展区”几乎都布局在城市群中。如贵州省以黔中城市群为主体空间,从最基础的数据中心起步,用三年时间形成全产业链规模,在多个领域“无中生有”地创造出大数据产业国内多个第一;在政府治理、民生事业等领域形成具有推广与借鉴意义的一批新模式。

目前世界经济缓慢复苏,正处于新旧动能转换时期,数字经济作为创新最活跃、发展最迅速、辐射最广泛的经济社会活动,为世界经济摆脱低迷、重焕生机指明了新方向,提供了新方案,带来了新希望。新方向决定了数字经济已经成为经济增长新引擎,是后金融危机时代推动经济社会转型、培育经济新动能、构筑经济竞争新优势的强大驱动力;新方案决定了数字经济必然成为经济发展的创新弹力板,需要把数字经济放在优先发展的位置进行重点推进、率先突破;新希望决定了数字经济能够消除域际空间边际,使每一个城市群都能够站在同一时间节点的新起跑线上,以前提在聚、关键在通、目的在用的操作新思路,破解城市群不同的新增长课题,在中国数字经济版图上找到发展新空间新坐标。

(三)把握好城市群长期实施经济国际化战略的基本发展趋势。

城市群长期实施经济国际化战略,建设现代化国际化城市群,是必须把握好的基本发展趋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之一是把深入改革开放

作为不可动摇的国策。城市群站在同一时间节点的新起跑线上,需要在经济全球化不可逆转的大趋势下,完美对接“一带一路”国家大战略,创造城市群发展空间新结构和新地理经济新布局。按照“五通”(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合力创造“五路”(和平之路、繁荣之路、开放之路、创新之路、文明之路)的工作部署,中国以“一带一路”、海陆统筹、拥抱世界、深度互动为主题与世界打造命运共同体,形成开放新格局。城市群要抓住“一带一路”不断变化的“窗口”机遇,定位精准、深耕细作、行动迅速,突出“三区”(自贸区、国家级新区、区域协同发展合作区)空间,展现“圈群”整体开放型经济发展新态势新形象,在经济走廊建设、国际产能合作、经贸园区共建等所有开放领域,长期深入实施经济国际化战略。

一是城市群长期深入实施经济国际化战略,要以构建国际前沿和高端产业集群为中心,打造国际开放合作新高地;以建设立体交通和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为中心,实现内外公路(高速公路)畅通、铁路(高铁)连通、航路相通,打造高效率海(江河)港、陆港、空港、信息港“四港”联动的国际人流、物流、商流性枢纽型大港口^[11]。特别是在标准化集装箱已经成为现代物流发展基石的态势下,更要突出多类型集装箱港口建设,不断提高与世界最先进集装箱港口建设技术实现完美结合的水平。2016年末统计,中国已经通过73个公路和水路口岸,与“一带一路”相关国家开通了356条国际道路客货运输线路;沿海主要港口运输服务全部覆盖“一带一路”沿线所有国家;主要空港与43个“一带一路”相关国家实现空中直航,达到每周约4200个航班。

城市群站在同一时间节点的新起跑线上,需要充分发挥日益发达的枢纽型大港口互联互通的作用,深入推进域际旅游经济新发展,在中国旅游市场总规模达到70亿人次、出境旅游达到7亿人次的基础上,建成开放性旅游经济新体系,使之成为国家开放型经济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12]。实证研究成果显示,中国出境旅游形成的庞大市场、快速增长、可观红利、无数机遇的发展新态势,已经令世界瞩目,让世界渴望分享中国出境游的红利^[13]。城市群要在大国区域经济发展空间新格局中,完美对接“一

带一路”国家大战略,通过“旅游+文化”搭台,打造不同特色“旅游+文化+经济”新投资平台,形成以城市群为主体空间的开放性旅游经济新体系,使旅游成为人民群众不断提高品质生活的幸福产业;使中国成为世界人民向往的旅游目的地;使中国旅游经济成为世界旅游经济增长的重要“一极”,并实现最为紧密的运行连接。

二是城市群长期深入实施经济国际化战略,要以建设财富管理中心和新金融中心为基本把手,建设国际化金融体系,完善金融产品运行全流程的创新链、资金链、人才链、服务链,建立互联网金融产业基地,形成强大资金流集聚辐射能力。随着2016年10月1日中国正式“入篮”(纳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特别提款权货币篮子生效),在国际经济贸易中广泛使用人民币成为通行规则,由此标志着人民币已经同美元等一样成为国际储备性的“世界货币”;标志着在经济生活中不再为经常性的兑换美元而“奔跑”、“绞尽脑汁”。城市群面向未来发展,更加需要不断强化金融体制改革和建立符合国际化标准的金融运行机制,充分释放辐射力。

三是城市群长期深入实施经济国际化战略,要打造好国际化街区 and 社区,优化空间布局结构,塑造城市特色风貌;以“互联网+”为中心,打造全球信息经济科创中心,抢占国际标准制定话语权;打造国际知名创新性领军企业,建设一批具有竞争力的跨国公司,充分发挥拥有的钢铁、建材、装备制造、光伏产业等比较优势,与沿带沿路国家广泛开展产能合作;以深化国际文化、艺术、教育、体育等方面为中心,不断拓展国际创新创业载体,承办越来越多的高水平国际会议、国际赛事等不断创新人文交流新模式,不断提高人文交流新水平,不断形成智库新共识;以深入研究世界各国自贸区的经验和多边贸易组织的规则,对标国际公认的高标准和新规则,打造当代开放广度与深度最高的自贸区,不断拓展“两国双园”新模式推动形成的商贸合作领域。目前上海自贸区已经由最初的28.78平方公里扩大到120.72平方公里,并在全国复制出10个自贸区,其发展指向是建设成熟型的、具有领先水平的自贸区。

四是城市群长期深入实施经济国际化战略,要把握住国家级改革试点示范试验区脉动与建立开放型

经济体系脉动的通联同步化。至今,国家已经相继批准建设的改革试点示范试验区主要有:自由贸易试验区、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国家级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国家级重点开发开放试验区、国家级内陆开放试验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综合试点区、国家大数据综合试验区、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国家省级全域科技成果转移示范区、国家首批全面改革创新试验区、国家信息经济示范区、服务贸易创新发展试点区、省级全域供销社综合改革试点区、全域旅游示范区及中国服务外包示范城市、国家文化消费示范城市、国家知识产权示范城市等,它们已经成为中国开放型经济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实践的发展,还会有新类型的国家级改革试点示范试验区出现,还会有更多的城市进入不同类型的国家级改革试点示范试验区先行先试行列。在这样的发展趋势下,城市群既需要充分发挥自身拥有的国家级改革试点示范试验区的作用,又要及时、适时、准时复制国家级改革试点示范试验区的经验,并在第一时间坚定地推广。

(四)把握好城市群经济在多领域融合交织一体化的基本发展趋势。

习近平同志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系列论述,深刻揭示了融合发展是经济发展必须遵循的规律。在实践中城市群经济已经显现出多领域融合交织一体化的基本发展趋势。站在城市群同一时间节点的新起跑线上,实现多领域融合交织一体化发展,特别需要突出“圈群”经济拥有的独特军民融合发展的比较优势。要在全域促进国防资源夯牢坚不可摧的梯次供给配置体系和战略纵深布局体系中,特别是在建设以情报侦察、卫星管理、电子对抗、网络攻防、心理战为主要使命的战略支援部队和以“后勤”为主要使命的联勤保障部队的进程中,实现无缝衔接的军民融合发展;以融合发展的新业态,保障提升新质国防资源配给能力,实现技术国防化、力量体系化、能力实战化。

城市群实现多领域融合交织一体化发展,要把握好以突出县域经济“基础性”地位的新农村品质发展的大趋势。城市群长期形成城乡空间融合交织并存格局,决定了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进程中,城市群必须坚定不移地把突出县域经济的“基础性”地位作为永恒的主题。在中国这样一个大

国,即使宣布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之日,城市群也更加需要各层级党和政府工作部门必须突出县域经济的历史性地位,把巩固以“三农”为主题的县域经济在取得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丰硕成果的基础上,继续把“三农”工作放置于特别重要的位置上来抓;更加需要以对党的绝对忠诚和对人民的担当担责精神,在 workflow 规定的时限内,坚决消除标准线下贫困反弹问题;更加需要“不忘初心,继续前进”,确保县域空间不断提高小康社会发展质量水平,在第一个“百年”目标实现后,保持好实现向第二个“百年”目标稳中奋进新常态。

站在城市群同一时间节点的新起跑线上,位处不同方位的城市群,都需要以深化供给与消费结构性改革为推动力,全面提高把新农村品质发展置于首位的水平,不断深化完善发展新模式、新路径;都需要以新动能新业态继续加快推进农业现代化,不断提高农产品生产工业化水平;都需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改革的正确方向,要以股份合作制为纽带,以“三权”制度为保障,通过资产联合、劳动联合,依法依规、精准确权、充分赋能、保值增值,建立符合生产力发展阶段的组织形式,形成科学合理的股权配置机制、流转交易机制、收益分配机制、资产监管机制等;都需要通过“三改一规”,划定永久基本农田,防止耕地“非农化”,从根本上解决把耕地红线作为“红飘带”,而出现随意性改变土地使用方向的问题,通过民主管理、民主决策、独立核算、自主经营、风险共担,建立符合新生产关系的“三农”治理新体制新机制。

(五)把握好城市群空间布局建设的智慧型基本发展趋势。

城市群空间布局建设的智慧型基本发展趋势,决定了建设智慧型城市群是“圈群”发展不可逆转的大趋势,这就需要突出创新驱动的“主引擎”地位。高举习近平治国理政伟大旗帜,就是要更加深刻领会为什么习近平同志在其著述中论及“创新”的语句至今已超过千余次。党和国家确立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指向的大目标是,到2020年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到2030年进入创新型国家前列,到2050年建成世界科技创新强国。

城市群空间布局建设的智慧型基本发展趋势,

决定了建设智慧型产业是“圈群”发展形成新经济体系的根本所在。

一是城市群要把握好现代服务业“智慧化”基本发展趋势,形成发展现代服务业的新态势。目前中国主要城市第三产业普遍超过50%,标志着城市现代服务经济在其发展空间的产业布局结构中已经成为居首产业,要长期保持居首产业,唯有不断提高现代服务业“智慧化”发展水平,实现“圈群”加快改造传统服务业的步伐,如全力推进城市群枢纽型大港口经济的发展,使之成为“圈群”经济发展的“第一纽带”力,形成越来越多的物流、商流等发展新业态,不断提高新常态下现代服务业发展新水平。

二是城市群要大力发展现代“智慧化”大文化产业。现代“智慧化”大文化产业涵盖的范围包括展览、出版、文艺、体育等产业;发展现代大文化产业,既包括公益文化事业,也包括市场文化产业。如国家确定的市场体育产业在“十三五”规划期完成3万亿元产值,在占GDP1%的基础上,全面实现与科技、文化、传媒、健康、养老、旅游等产业融合发展,突出发展多类型多模式的新业态。

三是城市群要形成“智慧化”杠杆经济发展新态势,突出经济“杠杆”的“造血”地位。城市群由金融、保险、税务、证券、基金组成的“杠杆性”经济体系,实现由传统“输血”模式向“造血”模式的转变,要确立起五大经济杠杆在“圈群”经济发展中的“造血”地位,形成杠杆经济发展新态势新业态;要不断完善与实体经济和创新创业相适应的现代金融服务体系,以做强做优主力品牌金融、着力发展总部金融、大力发展社会金融、创新发展互联网金融、规范发展“草根”金融等为主要内容,实现城市群达到世界水平的金融生态化。城市群在国家越来越强化控制总杠杆率的趋势下,必须高度关注和避免债务超警戒线问题。据预测,“十三五”规划期,中国必将保持年均增长速度6.5%的底线,到2020年中国GDP将接近百万亿元,甚至会更高;大区域“万亿元俱乐部”成员将扩大至27个省区市;2015年末中国以城市债务为主体的总额已达到168.48万亿元,已有区域债务率已超100%的警戒线;全社会杠杆率为249%,按照通常划分标准,一般债务主要依靠公共预算收入偿还,专项债务依靠政府性基金偿还,认

真避免债务超警戒线问题必须提到议事日程上来。

四是要使数字经济与制造业实现完美的融合性发展,已是不可更改的基本发展大趋势。中国通过强力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已经形成新型智慧性智能制造发展新格局。由中国经济信息社指数中心编发的“2016全球智能制造发展指数”比较结果显示,以建立包含4个一级指标、10个二级指标和22个三级指标的评价体系为基准,选定22个样本国家为评价对象,美国、日本和德国名列第一阵营的第一梯队,是智能制造发展的“引领型”国家;韩国、英国、中国、瑞典、瑞士、芬兰、法国、奥地利和加拿大名列第一阵营的第二梯队,是智能制造发展的“先进型”国家。中国在第一阵营中位居第六名,标志着我国已经进入智能制造发展先进型国家的行列。制造业是国家实体经济竞争力的首要标志,没有强大的制造业就没有在国际经济比较中的话语权;没有制造业的“大国工匠”,就不会拥有强大的国防科技产业。目前正处于第四次工业革命进入高潮期,同时进入全面完成“中国制造2025”战略目标的决胜期,实现智慧性智能制造需要围绕创新链布局产业链,围绕产业链布局资金链,实施绿色制造和绿色技术全覆盖工程,建设智能化、生态化的示范性绿色工厂和工艺线;需要以提高企业整体素质为推动力,在数控机床、工业机器人、智能制造装备等领域实现整机与配套并重、生产与服务并举、产业空间集中,提升关键基础材料、核心基础零部件与元器件、先进基础工艺和产业基础等工业基础能力;需要通过集群化,调强产业结构,建立以高端智能制造装备为引领的新产品结构,实现传统“中低端”产业结构的重组,牢固确立在世界制造业第一阵营中的位置,成为智能制造发展的“引领型”城市群。

(六)把握好城市群民生至上的基本发展趋势。

共享经济鲜明的第一特征是“民生至上”,城市群作为国民经济发展相对独立层次空间载体,乡村空间远超建成区空间,“圈群”要拥有强大发展生命力更加需要不断完善民生体系。站在城市群同一时间节点的新起跑线上,城市群突出共享经济“民生至上”地位,极其需要实现收入结构与消费结构、需求结构、价格结构、生产结构(简称“五大结构”)在一个平面上重新进行结构比的合理排列,并不断提

高合理排列水平,这是不断完善民生体系发展新态势的永恒主题。在全面进入小康社会后、建立科学合理“五大结构”过程中,无论多么发达的城市群,其城乡必然会出现相对贫困现象,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驱使而出现的社会现象。关键是要以“民生至上”的理念,针对城乡存在的相对贫困现象,不断调整制定合理的社会救助补贴政策,并落地落实。

城市群突出共享经济“民生至上”地位,极其需要把民众健康放置于“至上”的地位,因为人类追求长寿是“永远做不完的功课”。中国已经成功跨越了“人生七十古来稀”的历史阶段,新常态化下正在向着“百岁”长寿的历史阶段迈进。为此,必须继续落实党和国家 2016 年发布的《“健康中国 2030”规划纲要》明确提出实现的主要目标。

城市群突出共享经济“民生至上”地位,极其需要把人民群众普遍关注迫切需要解决的热点问题,放置于优先解决的程序议程上,不断提高民生工程建设满意水平。如 2016 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定位,决定了城市必须以人民群众“住有所居”为中心,依法依规,综合运用金融等经济杠杆,建立遵循房地产市场发展规律的基础性治理制度和长效机制。

从我国城市一般财政收入发展趋势看,城市财政直接用于民生支出占一般财政收入的比重应保持在 80%左右为宜;随着财政收入绝对额的不断增加,这一比重还应有上升的空间。

参考文献:

- [1] 郭先登.大国区域经济发展空间新格局理论与实践新发展的研究[J].环渤海经济瞭望,2017,(01).
- [2] 郭先登.大国区域经济发展空间新格局下省域空间生产力布局新探讨[J].环渤海经济瞭望,2017,(05).
- [3] 郭先登.创造城市发展空间理想统筹运行生态研究[J].环渤海经济瞭望,2016,(11).
- [4] 郭先登.实现城市由善政向善治伟大跨越的研究[J].环渤海经济瞭望,2017,(03).
- [5] 郭先登.环渤海经济圈率先践行新常态的思考[J].环渤海经济瞭望,2015,(05).
- [6] 郭先登.践行好区域发展总体战略实现城市发展新跨越[J].环渤海经济瞭望,2016,(04).
- [7] 郭先登.在建设成熟型经济中心城市中构建大国区域经济发展空间新格局[J].经济与管理评论,2014,(02).
- [8] 郭先登.关于大国区域经济发展空间新格局理论与实践的思考[J].经济与管理评论,2015,(01).
- [9] 郭先登.在加强合作中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N].人民日报,2013-05-09.
- [10] 郭先登.大国区域经济发展空间新格局城市规模结构的思考[J].环渤海经济瞭望,2016,(01).
- [11] 郭先登.大国区域经济发展空间新格局下枢纽型大港口发展空间研究[J].环渤海经济瞭望,2016,(07).
- [12] 郭先登.新常态化建制市乡镇村街旅游业发展思考[J].武汉纺织大学学报,2016,(05).
- [13] 郭先登.大国区域经济发展空间新格局下建制市“全域宜游”的研究[J].经济与管理评论,2017,(01).

(责任编辑:杨 磊)

The Basic Development Modality and Trend of Megalopolis Under the New Background of Big Country's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Space

GUO Xiandeng

(Qingdao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Qingdao, 266071)

Abstract: Facing a unprecedented practical period, the regional development in China steps into a great new era, and the megalopolis forming among adjacent single cities enters a new normal of neogociation and convergence. Because the megalopolis stands at the same starting point, we should firmly abide by the theory of President Xi Jinping, deeply understand its basic modality of development while practising perspective of "Urban megalopolis construction being object", clearly identify the trend of development of the megalopolis, and build the megalopolis as the pole and core point of growth as well as the space carrier of concentrating all kinds of production factors.

Key Words: Megalopolis; Development; The basic modality and trend; Research